

四川秦巴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减贫效应评价

胡捷¹, 陈抒阳¹, 刘国强¹, 祖立义², 傅新红^{1*}

(1. 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1130; 2. 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四川雅安 625014)

摘要 基于四川省秦巴山区4市13县(市、区)409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257名非社员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从经济发展、生活标准、社会参与、自我发展能力维度考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四川秦巴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社员经济发展、生活标准、社会参与方面的减贫效应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提出政府应在合作社制度、公共服务、扶贫政策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做出改进,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减贫效应。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减贫;倾向得分匹配法;四川秦巴山区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8)24-0205-05

Evaluation of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Farmer Cooperative in Qinba Mountainous Area in Sichuan

HU Jie, CHEN Shu-yang, LIU Guo-qiang et al (Management School of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130)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409 farmer cooperative members and 257 non-members in 13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of 4 cities in Qinba Mountainous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this paper use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o examine the dimens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iving standards,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elf-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farmer cooperatives in Sichuan Qinba Mountain Area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iving standard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members has not been fully realized.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improvements in the cooperative system, public service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Key words Farmer cooperatives; Poverty reduction;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Qinba Mountainous Area in Sichuan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扶贫工作深入推进,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贫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农民专业合作社因具有天然“益贫性”的特征,被视为贫困农户通过自助和互助来实现脱贫的理想载体^[1]。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还适应了多元贫困理论对扶贫实践的新要求^[2],是带动农民脱贫奔康的重要组织形式。因此,自2006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起,各级政府已出台不少相关政策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助农脱贫增收。

但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减贫效应众说纷纭。Sapovadia等^[3]认为合作社能为有一定工作技能但缺乏资金的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其收入,从而摆脱贫困。韩国民等^[4]发现合作社通过增加就业、培训机会,提高贫困户社会福利等经济效益助推非洲减贫。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从分散的“原子化状态”进入规范的“组织化状态”,学会理性地表达自身诉求,实现利益最大化。鉴于此,吴定玉^[5]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反贫困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然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没有针对贫困社员的特殊制度安排^[1]。虽然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能促进社员收入增长,但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难以保证贫困户利益^[6]。贫困农户认知偏差、合作层次不高和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合作机制的构建^[7]。对此,汪三贵等^[8]提出应探索和建立贫困户的受益机制。梁巧

等^[9]认为应在合作社法中加强对“经营俘获”现象的规制,李红玲^[2]指出合作组织能否发挥、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多元减贫效应,需要当地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支撑。

综上所述,目前已有学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益贫性进行研究,但大多停留于理论探讨层面,缺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减贫效应的深入评价,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实证研究更是凤毛麟角。鉴于此,笔者选取四川秦巴山区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实证考察四川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减贫效应,旨在揭示实践中合作社对农户精准脱贫的贡献程度。研究将有助于找寻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的短板,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减贫效应。

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基于多维贫困理论,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文献及四川秦巴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减贫实践,从经济发展、生活标准、社会参与、自我发展能力维度评价农民专业合作社减贫效应。

1.1 经济发展 助农增收是脱贫的关键,但贫困地区农民面临初级产品与加工产品价格差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双重价格“剥削”^[5]。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对农副产品进行粗、深加工,利于社员获取更多的增值收入,通过规模经营恰好可以缓解社员双重价格“剥削”。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_{01} ——四川秦巴山区社员在经济发展方面将明显比非社员优越。

1.2 生活标准 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社员系列特殊服务,例如合作社无偿对当地的乡村道路进行维修,为社员生产运输提供方便^[1]。此外,承接国家扶贫资源,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发挥有机衔接的载体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从总体上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_{02} ——四川秦巴山区社员在生活标准方面将明显比非社员优越。

基金项目 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16ZR0240, 18RKX0778, 18RKX0751);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CR1302);四川农业大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项目(2017YB08);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农村精准扶贫创新研究团队”;现代农业产业组织及制度创新研究团队。

作者简介 胡捷(1996—),女,四川成都人,从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研究。*通讯作者,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收稿日期 2018-06-11;修回日期 2018-07-05

1.3 社会参与 贫困地区的农民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形成了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较少参加社会活动,不能很好地与整个社会融为一体^[10]。因此,社会参与性较差、社会交往强度较低进一步加深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而农民合作社强化了农村社会的群体性和组织性,通过集结农户共同形成规模化农业生产,发挥其黏合作用,建立起以合作为主旨的农民社会关系网络^[11]。同时合作社还通过权责利分配和参与式管理,使贫困户获得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和决策的权力,社员可以从自由投票中体会到尊严的维护,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从而增强自信心,提高社会参与性^[12]。因此,农民合作社可以提高社员社会参与积极性、社会交往强度。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₀₃——四川秦巴山区社员在社会参与方面将明显强于非社员。

1.4 自我发展能力 贫困不仅指低收入,更指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及机会的丧失^[13]。目前不少农村贫困人口缺乏基本的生存技能,所以扶贫应注重培植和诱导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其内生力量增长。农民合作社强调扶贫主体的主动性,而不是被动参与,社员通过参与公共管理、农业技术培训、市场信息获取等途径培养了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等自我发展能力^[14]。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₀₄——四川秦巴山区社员在自我发展能力方面将明显优于非社员。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该研究以四川秦巴山区的广元、南充、巴中、广安4市为调查区域,该区域是四川四大贫困片区之一,同时秦巴山区也是全国14个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研究扶贫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采用典型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咨询市扶贫移民局、农经站,基于各地农民合作社减贫实践,在每个地级市选取1~4个样本县开展实地调查,调研员随机抽取了800名农户实施问卷调查。

此次调研主要针对四川秦巴山区农民合作社社员与非社员开展,以便深入了解四川秦巴山区农民合作社减贫效应,剔除部分信息大量缺失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666份,问卷有效率83%。其中409份为农民合作社社员,257份为非社员。样本分布见表1。

2.2 研究方法 为了排除内生性问题和因非随机选择是否参加合作社而导致评价结果有偏的误差,该研究利用国外政策评价常采用的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考察四川秦巴山区农民合作社的减贫效应。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基本思想是:由于处理组(参加农民合作社)与对照组(未参加农民合作社)为非随机选择,根据影响农户参加合作社的特征变量,将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样本进行匹配,从而使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主要特征尽可能相似;再利用对照组尽可能地模拟处理组的反事实状态(未参加合作社),比较个体在参加和未参加合作社这两种情形下的经

济发展、生活标准、社会参与、自我发展能力方面的差异。倾向得分匹配法基本步骤如下。

表1 样本分布
Table 1 Sample distribution

城市 City	县(市、区) County (city, district)	样本量 Sample size	占比 %
广元 Guangyuan	苍溪县	117	17.57
	剑阁县	64	9.61
	旺苍县	66	9.91
	昭化区	38	5.71
	广安区	22	3.30
南充 Nanchong	岳池县	85	12.77
	南部县	26	3.90
巴中 Bazhong	阆中市	72	10.81
	恩阳区	43	6.46
	巴州区	13	1.95
	南江县	79	11.86
	通江县	17	2.55
	平昌县	24	3.60
合计 Total		666	100.00

(1) 计算倾向得分值。通过Logistics模型对参加合作社的特征匹配变量计算出每个样本参加合作社的条件概率即倾向得分值。Logistics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P_i = \frac{1}{1 + \theta^{-r_i}} = \frac{1}{1 + \theta^{-(\alpha + \beta x_i)}} \quad (1)$$

进一步转换为:

$$\ln \frac{P_i}{1 - P_i} = r_i = \alpha + \beta x_i + \mu \quad (2)$$

式中, P_i 为表示第*i*个农民选择参加农民合作社的条件概率; x_i 为纳入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程度、决策者是否为党员、决策者是否为村干部、决策者决策方式、是否为(曾经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党员人数、家庭村干部人数、家庭负债数; β 为估计系数; μ 为误差项。

(2) 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匹配。采用最近邻匹配中的“*k*近邻匹配”,即寻找倾向得分最近的*k*个不同个体。

(3) 数据平衡性检验。在进行倾向得分分析之前,需要检验配对样本在可测的特征变量上有无显著差异,从而确保匹配效果的精确性。

(4) 农民合作社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测算。定义为:

$$ATT(x + \alpha)^n = \sum_{k=0}^n \binom{n}{k} x^k \alpha^{n-k} E[Y_{1i} | D_i = 1, P(x_i)] - E[Y_{0i} | D_i = 0, P(x_i)] \quad (3)$$

式中, $E(\cdot)$ 代表期望值, Y_{1i} 代表第*i*个农民受合作社作用后的结果变量(包括经济发展、生活标准、社会参与、自我发展能力方面); Y_{0i} 代表同一农民未受合作社作用的结果变量; D 代表农民是否参与合作社的虚拟变量($D = 1$ 为处理组, $D = 0$ 为对照组)。为了保障结果的稳健性,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来获得ATT的标准误,自抽样循环次数设定为

200,进而进行统计分析。

2.3 变量定义

2.3.1 被解释变量。该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一个二元变量。在问卷中以“是否参加农民合作社”来表征,如果样本农户参加了农民合作社,则取值为1,为处理组;反之为0,为对照组。

2.3.2 评价指标。基于理论分析和四川秦巴山区农民合作社减贫实践,该研究从经济发展、生活标准、社会参与、自我发展能力4个维度考察四川秦巴山区农民合作社减贫效应(表2)。

(1)经济发展方面。韩国民等^[15]认为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社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而增加农民收入是脱贫的关键^[5]。该研究选取农民年家庭纯收入这一指标来刻画。

(2)生活标准方面。借鉴《人类发展报告2013》多维贫困指数在生活标准这个维度的指标,该研究选取了饮用水安全、通电情况、生活燃料、卫生设施这4个指标来表征。

(3)社会参与方面。结合田飞^[16]的贫困指标体系、刘彬彬等^[17]的理论研究,选取人情支出、参加村里公共事务和集体活动的频率分别作为社会交往强度和社会参与性的指标来表征。

(4)自我发展能力方面。多维贫困研究鼻祖阿玛蒂亚·森指出,人的发展能力包括健康长寿能力,获得文化、技术及分享社会文明的能力,摆脱贫困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结合中国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情况,选取健康状况、参与技术培训意愿、农产品销售难易程度、资金投入能力这4个指标来刻画。

表2 评价指标描述及说明

Table 2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on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指标 Index	分类指标 Classification indicator	指标说明 Indicator description
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i>E</i>)	年家庭纯收入(E_1)	以元为单位
生活标准	饮用水安全(L_1)	1=安全;0=较不安全
Living standard(<i>L</i>)	通电情况(L_2)	1=没通电;2=间断性通电;3=常年通电
	生活燃料(L_3)	1=安全;0=较不安全
	卫生设施(L_4)	1=无厕所;2=旱厕;3=水冲式厕所
社会参与	年人情支出(S_1)	以元为单位
Social participation(<i>S</i>)	参加村里公共事务和集体活动的频率(S_2)	1=从不参加;2=偶尔参加;3=一般;4=经常参加;5=每次都参加
自我发展能力	健康状况(D_1)	1=非常不好;2=不太好;3=一般;4=良好;5=非常好
Self-development ability(<i>D</i>)	参与技术培训的意愿(D_2)	1=完全不愿意;2=不太愿意;3=无所谓;4=愿意;5=非常愿意
	农产品销售难易程度(D_3)	1=非常困难;2=有一点困难;3=一般;4=比较容易;5=非常容易
	资金投入能力(与同村平均家庭收入水平对比)(D_4)	1=低很多;2=中等偏下;3=差不多;4=中等偏上;5=高很多

2.3.3 特征匹配变量。借鉴马彦丽等^[18]对农民参加合作社的意愿分析,结合调查问卷数据资料,选取表3所示变量进

行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特征匹配。

表3 特征匹配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3 Definition of characteristic matching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序号 No.	变量 Variable	取值及其含义 Value and its meaning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1	性别(X_1)	1=男,0=女	0.848 3	0.359 0
2	年龄(X_2)	实际数(岁)	54.806 3	11.790 8
3	年龄平方(PfX_2)	实际数(岁的平方)	3 142.545 0	1 282.972 0
4	受教育程度(X_3)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6.855 9	3.253 7
5	决策者是否为党员(X_4)	1=是,0=否	0.207 2	0.638 8
6	决策者是否为村干部(X_5)	1=是,0=否	0.111 1	0.314 5
7	决策者决策方式(X_6)	1=完全跟随别人的决定;2=偶尔跟随别人的决定;3=参考别人的意见,自己做决定;4=总是自己独自决定;5=可以影响周围人的决定	3.171 4	0.926 9
8	是否为(曾经为)建档立卡贫困户(X_7)	1=是,0=否	0.201 2	0.401 2
9	家庭党员人数(X_8)	实际数	0.267 7	0.518 3
10	家庭村干部人数(X_9)	实际数	0.129 1	0.361 5
11	家庭负债数(X_{10})	实际金额(元)	19 793.192 1	13 838.850 0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倾向得分的Logistics估计 运用Logistics回归模型估

计出农民参加合作社的概率,即倾向得分值,结果见表4。表4显示,大多数变量通过0.10及以上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

中,年龄对参加合作社具有显著影响,且呈倒“U”形的关系;决策者是否为村干部对参加合作社的影响显著为正;决策者决策方式越独立,越愿意参加合作社;决策者为(曾经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更愿意参加农民合作社。家庭中党员人数越多,参加合作社的概率越大;而家庭村干部人数与参加合作

表4 Logistics模型的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Logistics model

变量 Variable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X_1	0.189 9	0.237 2
X_2	0.127 6***	0.049 1
PfX_2	-0.001 2***	0.000 4
X_3	0.029 8	0.030 4
X_4	-0.116 0	0.146 4
X_5	1.564 6***	0.535 1
X_6	0.187 2**	0.095 3
X_7	0.573 5***	0.213 8
X_8	0.369 5*	0.208 6
X_9	-0.980 7**	0.457 3
X_{10}	3.46e-06**	1.75e-06
常数项 Constant term	-4.102 5***	1.422 7

注:***、**、*分别表示0.01、0.05、0.10显著性水平

Note: ***, **, and *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0.01, 0.05, and 0.10, respectively

社的意愿程度呈反相关。而性别、受教育程度、决策者是否为党员对农民是否参加合作社没有显著性影响。

平衡性假设检验中,从表5可知,用 k 近邻匹配法匹配后,可测的特征变量的标准误差都大幅度降低,反映出影响参加农民合作社的主要特征差异已大幅度消除,配对样本具有高度相似性。而且大多数变量的标准误差都小于10%,说明满足平衡性假设^[19]。

3.2 匹配结果分析 基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倾向得分值,运用 k 近邻匹配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匹配,进而探寻处理组和对照组在经济发展、自我发展能力、社会参与和观念转变方面的差异。表6为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

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一年家庭纯收入显著性水平大于0.1,说明参加农民合作社未显著性的提高农民家庭纯收入。这与研究假设 H_{01} 相悖,与薛凤蕊等^[20]的研究结果相反。该研究结合胡联^[6]对贫困地区合作社与农户收入增长的分析以及其他相关文献和四川秦巴山区现状,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由于四川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社社员存在异质性,所以合作社对社员经济的促进存在差异性。并且尽管合作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农业净收入,但其提高的幅度并未高于非社员从事非农工作所获的收入。

表5 平衡性假设检验结果

Table 5 Balance hypothesis test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均值 Mean		误差 Error		t-test	
		处理组 Processing group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标准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	误差消减 Error reduction//%	t	$P> t $
X_1	匹配前	0.865 2	0.818 9	12.7	-33.8	1.59	0.112
	匹配后	0.863 9	0.802 0	17.0		2.36	0.018**
X_2	匹配前	54.596 0	55.309 0	-6.0	31.3	-0.75	0.453
	匹配后	54.626 0	54.136 0	4.1		0.65	0.514
PfX_2	匹配前	3 101.300 0	3 223.700 0	-9.4	43.2	2.01	0.045**
	匹配后	3 105.500 0	3 036.000 0	5.4		0.85	0.395
X_3	匹配前	7.090 7	6.489 7	18.3	30.0	2.27	0.024**
	匹配后	7.054 5	6.633 7	12.8		1.87	0.062*
X_4	匹配前	0.227 9	0.181 1	7.1	68.3	0.90	0.370
	匹配后	0.222 8	0.237 6	-2.2		-0.41	0.683
X_5	匹配前	0.139 7	0.070 0	22.9	82.3	2.72	0.007***
	匹配后	0.138 6	0.151 0	-4.1		-0.50	0.618
X_6	匹配前	3.262 3	3.049 4	22.8	75.6	2.85	0.005***
	匹配后	3.257 4	3.205 4	5.6		0.80	0.424
X_7	匹配前	0.230 4	0.164 6	16.6	62.4	2.01	0.045**
	匹配后	0.230 2	0.205 5	6.2		0.85	0.395
X_8	匹配前	0.311 3	0.205 8	20.7	27.3	2.51	0.012**
	匹配后	0.302 0	0.378 7	-15.0		-2.03	0.043**
X_9	匹配前	0.147 1	0.102 9	12.1	94.4	1.50	0.134
	匹配后	0.148 5	0.151 0	-0.7		-0.10	0.922
X_{10}	匹配前	24 283.000 0	10 749.000 0	25.1	72.9	2.87	0.004**
	匹配后	21 850.000 0	18 178.000 0	6.8		0.97	0.331

注:1.***、**、*分别表示0.01、0.05、0.10显著性水平;2.匹配方法为 k 近邻匹配法, $k=1$

Note: 1.***, **, * respectively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0.01, 0.05, 0.10; 2. The matching method is k -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 method, $k=1$

从生活标准方面来看,饮用水安全、通电情况、卫生设施的显著性皆大于0.1,说明参加农民合作社未显著性地影响饮用水安全、通电情况和卫生设施。而参加农民合作社对生活燃料的影响呈0.0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与吴彬等^[1]的研究结果相反。结合李红玲^[2]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多元扶贫逻辑与公共治理的研究及四川秦巴山区现状,认为可能的原因如下:首先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社员的特殊服务未很好的开

展;其次当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未在最大范围内帮助合作社发挥其多元减贫效应。

从社会参与方面来看,人情支出和参加村里公共事务与集体活动频率的显著性皆大于10%。与李红玲^[12]、林万龙等^[21]的研究结果相反。该研究结合程晓娟等^[11]、包晓霞^[22]的观点,认为四川秦巴山区贫困农民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已形成了一种较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因

此,他们社会参与的改善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并且,有的合作社运营不太规范,而贫困地区的合作社更是如此。

从自我发展能力方面来看,参加农民合作社不仅改善了农民健康状况,还提高了农民参与技术培训的意愿。农民合

作社在 0.05 水平上显著性的降低了农民农产品的销售难度,同时农民的资金投入能力也在 0.05 水平上显著性提高。这验证了研究假设 H_{04} 。

表 6 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结果

Table 6 Estimation results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序号 No.	变量 Variable	处理组 Processing group(1)	控制组 Control group(2)	差分 Difference(ATT) (3)=(1)+(2)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T 值 T value
1	年家庭纯收入(E_1)	76 741.871 6	77 891.901 2	-1 150.029 6	12 278.720 0	-0.09
2	饮用水安全(L_1)	0.442 0	0.513 6	-0.716 0	0.059 8	-1.26
3	通电情况(L_2)	2.997 5	3.000 0	-0.002 5	0.002 1	-1.00
4	生活燃料(L_3)	0.306 2	0.438 3	-0.132 1	0.056 5	-2.36 **
5	卫生设施(L_4)	2.592 6	2.498 8	0.093 8	0.060 4	1.59
6	年人情支出(S_1)	11 990.298 5	8 713.432 8	3 276.865 7	2 641.284 0	1.34
7	参加村里公共事务和集体活动的频率(S_2)	4.175 3	3.969 1	0.206 2	0.156 4	1.38
8	健康状况(D_1)	3.733 3	3.476 5	0.256 8	0.131 7	1.97 **
9	参与技术培训的意愿(D_2)	4.170 4	3.970 4	0.200 0	0.110 8	1.67 **
10	农产品销售难易程度(D_3)	3.529 7	3.196 8	0.332 9	0.143 6	2.29 **
11	资金投入能力(D_4)	2.997 5	2.728 4	0.269 1	0.128 7	2.16 **

注:1. ***, **, * 分别表示在 0.01, 0.05, 0.10 水平显著; 2. 匹配方法为 k 近邻匹配法, $k=1, 3$; 标准误采用自抽样法反复抽样 200 次得到
Note: 1. ***, **, * respectively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0.01, 0.05, 0.10; 2. The matching method is k-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 method, $k=1, 3$. Standard error is repeated 200 times by self-sampling method

4 结论与建议

该研究基于四川秦巴山区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经济发展、生活标准、社会参与、自我发展能力 4 个方面考察四川秦巴山区农民合作社的减贫效应,得出以下研究结论:①农民合作社显著提高了四川秦巴山区社员自我发展能力,能力减贫是合作社减贫的有效路径。②农民合作社对四川秦巴山区社员经济发展、生活标准及社会参与方面没有明显的总体改善,这是未来减贫效应提升的着力点。

由此可见,目前四川秦巴山区农民合作社并未充分发挥其扶贫功能,如何提高其减贫效应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政府应更好地规范农民合作社的成立和运行,引导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农民合作社是由农民内生动力形成的组织,如果引导得当,将使贫困社员经济发展方面得到显著改善。因此,当地主导部门应加强对合作社的监管,保障贫困社员在合作社内部的利益,促进贫困社员增收脱贫。

(2) 政府应为农民合作社成长提供农业综合服务,帮助合作社更好地发挥经济发展方面的减贫效应。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社大多存在规模小、服务范围窄的问题,规模经营的预期效果很难得到实现。因此,政府应帮助合作社拓展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合作社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合作社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3) 农民合作社应优化管理,严格做到自由平等。并在政府、社会的帮助下引导社员拓宽社会关系网络,充分带动社员的社会参与积极性、社会交往程度。目前贫困地区的合作社发展不够健全,存在少数人控制的现象,未能发挥合作社对社员社会参与的改善,不利于减贫。

参考文献

[1] 吴彬,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益贫性及其机制[J].农村经济,2009(3):115-117.

- [2] 李红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与公共治理[J].贵州社会科学,2014(7):133-139.
- [3] SAPOVADIA V, PATEL A. Driver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cess: Empirical study of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from India[Z].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Paper, 2013.
- [4] 韩国民,高颖.西部地区参与式扶贫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互动研究[J].农村经济,2009(10):116-118.
- [5] 吴定玉.农业合作社:新世纪反贫困的组织支撑[J].农业经济,2000(8):21-22.
- [6] 胡联.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收入增长: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2014(12):117-126.
- [7] 牟永福,刘娟.贫困农户合作机制研究:合作式贫困治理结构的视角[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6(4):140-143.
- [8] 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 [9] 梁巧,吴闻,刘敏,等.社会资本对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行为及绩效的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11):71-79.
- [10] 汪建,庄天慧.贫困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四川16村301户农户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5(4):69-73.
- [11] 程晓娟,张霞.贫困地区致贫因素指标体系研究[J].开发研究,2005(2):48-50.
- [12] 李红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逻辑[J].贵州社会科学,2013(3):113-117.
- [13] 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4] 刘宇翔.连片贫困地区农民合作扶贫模式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6,32(6):41-48.
- [15] 韩国民,高颖.西部地区参与式扶贫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互动研究[J].农村经济,2009(10):116-118.
- [16] 田飞.贫困指标体系问题研究[J].学术界,2010(11):211-219.
- [17] 刘彬彬,陆江,李晓平.社会资本与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检验[J].农业技术经济,2014(11):40-51.
- [18] 马彦丽,施轶坤.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行为及其转化[J].农业技术经济,2012(6):49-60.
- [19]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M].2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 [20] 薛凤蕊,乔光华,姜冬梅.土地合作社对农户收入影响评价[J].农业经济问题,2012(5):34-39.
- [21] 林万龙,钟玲,陆汉文.合作型反贫困理论与仪陇的实践[J].农业经济问题,2008(11):59-65.
- [22] 包晓霞.中国西北贫困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基于 400 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2(4):34-38.